

人人都被培养成“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

## 培养“精明人”的社会

记得一次在伦敦街头购买物品,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选中一个Nike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我随意问了一句:这是真Nike还是假Nike?友人对此问题大感不解,深表惊诧,问:他为什么要造假的卖假的?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都感受过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的难处和难度:你得具备方方面面的知识,有些还相当专业——从物理、化学、机电、材料、建筑、通讯到医学、农业、经济、法律乃至社会、文化、心理,能在各种不同的专业领域中辨识真假,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你得有很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能自己动手解决生活中不时发生的水、电、电器、家具等方面的故障,会修理马桶漏水、电路短路、电脑故障等等;你还得人情练达,通晓世故,有很强的社会交往能力,遇事能找到熟人,拉上关系,解决正常情况下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自身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承受各种打击而百折不挠。想想吧,作一个普通消费者容易吗?哪里仅仅是花钱买商品、买服务这么简单啊?没有规范的市场、合理而有效的制度,普通消费者就会逐渐趋于全知全能,因为最普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到是处处陷阱、事事磨难,没有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



带孩子亲近大自然,是许多英国家长和教师热衷的活动。英国人普遍有个有趣的共识:热爱大自然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常去山间水边度假。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去山间水边走走,让孩子们亲眼观察田野是如何向人类提供粮食、蔬菜和水果的,森林是如何向人类奉献木材和更为宝贵的新鲜空气的,江河湖泊是如何向人类供应水源以及鱼虾等水产的,大山是如何向人类敞开自己的怀抱呈献上无价的矿藏의……

▲鼓励孩子投入相关的活动。如有的中小学发起“以望远镜取代弹弓”——那些淘气的男孩再也不拿弹弓来射杀无辜的鸟儿,而是在清晨或傍晚,用望远镜观察各种各样的鸟儿如何哺育子女,如何谈情说爱,如何交配繁殖。奇特的“录音大赛”要求孩子们录下种种“动听的自然声音”,结果有的录下了飞翔蜜蜂的嗡嗡声,有的录下了雨打芭蕉叶的啪啪声,有的录下了夜莺银铃般的啼鸣,有的录下了轻柔游丝的风声,有的录下了雨后庄稼“巴吱巴吱”的拔节声,但最后荣获冠军者却更为独具匠心——其作品竟然是一盘在森林里录下的完全无声的磁带!

▲英国地处温带,本无热带雨林,但伦敦23所小学的小学生,在教师的指导和家长的鼓励下,利用一家废弃的展览馆,成功地“人造”了一片总面积达1500平方米的热带雨林。在人造阳光的照射下,沼泽地腾起阵阵水气,腐败枝叶散发出的气味迎面扑来。突然一声闷雷炸响了,瓢泼大雨接踵而至。到了夜间,各种各样的蛙鸣虫吟不绝于耳,而举头一望,透明的夜空中挂着一轮明月……当然,创办该人造雨林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增添孩子们对大自然的深情。

(摘自《羊城晚报》3.20 唐绿意/文)

人人都必须“精明”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社会的毛病。没有合法合理的制度与规则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人人做事都得提着心,吊着胆,把任何对方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吃亏。而时至今日,即使是熟人、朋友也难以信任,“杀熟”之举不是已经屡见不鲜了吗?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因为基本的信任结构已经崩塌,交易成本高得惊人。

盛产“精明人”的另一重要机制就是社会的评价体系。“精明人”精于包装炒作,擅长把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装点得花哨热闹。而一个社会评价机制如果不断地肯定、褒奖这类做法,而且让这些人们得到各种好处,那将使更多的精明人层出不穷,会败坏一个社会的风气并给下一代人的选择带来极坏的影响。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甚至诡计多端,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人人都被培养成“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摘自《经济观察报》郭于华/文)

在今年的两会上,道德成了一个热门词汇。政协委员李小琳提出建议:“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人大代表文花枝则提交了一份设立雷锋奖的议案。这些意见除关注道德外,背后还有一个共同

## 让权力重建道德找错了方向

点,即呼吁政府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论是“道德档案”还是“雷锋奖”,当然不是提议者自己去设立,提议者心目中能这样做的或他希望出来做的,还是政府。但寄望于政府重建道德,似乎找错了方向。

道德管的是人心,而政府管的是人的行为。如果人心也由政府来管,则必然会出现事实上的政教合一现象。由于政府功能的限度,即使政治家出于好心、并无私念,其权力扩张也必然会带来极大的社会恶果。中国人曾经经历过“人民公社”、“大跃进”,其强国富民의初衷或许是美好的,却事与愿违,这是那些事事欲求助于政府、寄希望于政府的人不该忘记的。

权力有一个特征,即自我强化与膨胀,如不加以限制,它就会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侵吞本属于市场和社会的事情。将世俗的政治权力与精神领域的权力分离,也就是把管人心的权力与管人行

的权力分离,是国家文明的标志。因为一旦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合一,就造成一个真正的极权社会,社会的自治、公民的自由甚至隐私都荡然无存。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政府不能做,个人好像也无力,那么如何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走出道德危机?我以为,还是要允许社会、个人在精神文化领域的自由探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道德的维系,其实常在于某种宗教、某种信仰,某些精神上的先驱以及精神作品的支撑。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宗教、信仰去自由选择,有一天批思考者与实践者自由地创造出优秀的精神作品,我想,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会在多样化的探索中不断提高。

(摘自《中国青年报》3.23 李开盛/文)

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官用。

## 朱元璋之悲与苏绰定律

在中国历代帝王行列中,朱元璋素以治吏严肃、惩腐酷厉著称,但却未能遏制住贪腐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以致发出绝世之悲叹:“我欲除贪赃官,奈何朝杀而暮犯?”

其实朱元璋苦思冥想彻夜难眠的历史难题,早在其八百多年前就被一个叫做苏绰的文人所识破,这就是著名的苏绰定律。苏绰是北周开国帝王宇文泰的谋臣,对于中国历史上贪官不絶如缕,朝代代代都有巨贪大奸,自然是心知肚明。故某日宇文泰想请教苏绰如何治国方能延续江山永祚之道时,苏绰立即给出了这个定律——以贪反贪,方能控制官吏离心异志。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苏绰答:“用官。”

宇文泰问:“如何用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宇文泰问:“贪官何以用?”

苏绰答:“你要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别人好处。而你又没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们权,叫他们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可以拥权自肥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力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苏绰答:“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力,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力。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稳固了吗?”



一个北京市民,带着我和我的同事到了菜市口的一个胡同,康有为的故居就在这里。

走进去,一个典型的大杂院,只要能造房子的地方,都盖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只不过现在,搬走得差不多了,墙身上用红漆标注着数字。康有为的七树堂门口,变成了垃圾堆,树早就没有了,留下半颗枯树,成为了现成的电线杆。

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总是以为,既然已经挂上了文物的牌子,那房子一定是可以留下来的,而现在看看发展商贴在地盘外面的效果图,在角落有一个现代的四合院的图案,想必就是这个地方的将来。不知道是重新设计,然后挂上康有为故居的牌子,还是会变成一个用康有为故居作为招揽的高档会所?

带路的市民是一个热爱北京文化的北京人,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胡同里面寻找那些有着不同故事的四合院,和其他同道者一起,编制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希望这些地方能够被保留下来。当然,结果只是让他们一次次的失望,曹雪芹故居没有了,梁林故居没有了,就连梁启超的故居,他们收到消息,也要拆除了。在这些北京人的眼中,这些就是构成北京历史和文化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当人们谈论古都北京,文化名城北京的时候,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那文化和历史,就变成了空壳。

其实不单单是北京,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是一样,当农村快速地消失,城市变得千城一面的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正在自己埋葬着历史,我们快速地向前进着,留给我们后代的,是一个他们不知道如何走过来的现在,而在这样的姿态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是不是也会像我们这一代一样,将来快速地把我们这一代的东西抛弃呢?

一个同样关心北京历史和文化的大学教授,讲起她的一个学生居然不知道谁是孙中山,这是让她到现在也无法接受的现实,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教育,我们生活的地方,是看不到历史的痕迹的,那又如何能够责怪我们的下一代呢?就好像我告诉教授,我听到后海的银淀桥拆了,我觉得太可惜,她笑了,原来我走过的那座银淀桥早就是复制品,原来的那座在六十年代就拆掉了,而我看到的后海,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

(摘自《外滩画报》3.21 阎丘露薇/文)

## 我们正在自己埋葬着历史

## 孙立哲:史铁生是我的救星

孙立哲,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当上赤脚医生并成为一代知青偶像。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近日,孙立哲口述了他与史铁生的生死情谊。

史铁生帮我写检查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远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因为此信,“四人帮”倒台后,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要审查。我政治上垮了。不久,我得了亚急性肝坏死这个病,回京治病。有一天,军代表到我家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并令我在几天内写出交待认罪材料。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

我在延安受审查,北京那边,铁生家是“捞”人联络

## 此案是我谢觉哉改的



但谢老却不这样想,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怎么得了呀!”

1962年5月,谢老视察西安,抽查法院案卷时,发现“王为业反革命案”有可疑之处。案卷上写着:原审三原县法院,以王犯趁我党整风之机,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及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几十封信,谩骂我党革命领袖,攻击各项政策,给章伯钧去信献策将农工民主党改为“农民民主党”等,判处王犯10年徒刑。王犯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改判王犯有期徒刑20年。投狱劳改后,王犯还不服,抗拒改造,法院又增刑4年,共24年。该犯仍然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等,市法院拟判死刑,省人人民法院决定改判无期徒刑。

谢老仔细研究材料,认为案子有问题。他说:“宪法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而且判得这样重。这样做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

针对办案中“宁左勿右”的办案人员,谢老语重心长地说:“……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有人来翻看这个档案,他要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向毛主席写封信就犯了罪?他向最高人民法院告状,你们也不把状子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而把它扣压起来,这样做不行嘛。”在他的坚持下,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为业由无期徒刑改判无罪释放。为了表示对此事负责,也为了不让有关同志受到连累,谢老特地案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觉哉改的!”

(摘自《北京日报》2011.8.1 刘波/文)

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申诉书递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

当天晚上,我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

两个病人互相扶持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瘫痪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

## “文革”时飞行员的对话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年轻时当过空军,他回忆:“文革”时,飞机上天之前,飞行员要报:“起飞,沿着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地面喊:“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前进!”两机交汇,这边说:“为人民服务,我爬高300米!”那边回答:“为人民服务,你可以爬高……”每当飞行员按下飞机发动按钮时,需要一个地面机械员查看燃烧是否充分,这边飞行员点火的时候喊一声:“打倒刘少奇!”,地勤看点火成功,就说:“打倒了!”(摘自《档案春秋》)



## 俄文版《毛泽东语录》略去“主席”二字始末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以多种外文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其他外文版本的书名都是《毛泽东主席语录》,唯独俄文版本没有“主席”二字,只是《毛泽东语录》。

略去“主席”二字,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这被认为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是反革命的有意破坏。

然而,俄文版所做的“省略”是有其依据的:(1)当年苏联拥有数十万个集体农庄,每个农庄都有一位主席,再加上政府各部门、各群众

他爸从此没说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痪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立哲,第五章献给你”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人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住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都成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3.9 孙立哲口述 阎阳生整理)

## 英军战俘用摩尔斯电码骂希特勒

日前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展出的是一件刺绣作品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二战历史——当时被德国纳粹俘虏的英军少校亚力克西斯·加斯达戈里在战俘营里用以降落伞上扯下来的丝线刺绣,但谁知他却用摩尔斯电码在其中绣上了“上帝保佑国王,F\*\*\*希特勒”的内容,而纳粹德军未发现蹊跷,还将其作品在战俘营里

展出达数十年之久。

亚力克西斯1941年至1945年被关押在德国的战俘营中,1990年逝于英国家中。据他的儿子、现年79岁的老人托尼介绍,他父亲自小爱好刺绣,而正是这一爱好好让他度过了战俘营难熬的岁月——一想到他咒骂希特勒的刺绣作品却被纳粹高高悬挂每日欣赏,亚力克西斯和他的战友们就觉得非常好笑。

“虽说是战后红十字会拯救了我父亲的性命,但却是这件刺绣作品拯救了他的灵魂,”托尼说。

(摘自《中国日报》梁彬/文)

## 那图

如牛毛,已失去了应有的亲切感,不再是一种令人景仰的尊称,倒有点儿像在中国称“科长”、“处长”的感觉。(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经典著作的书名从来没有“官职”之类的称呼。

在即将发稿前,就“主席”一词的取舍问题仍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毛著室的红卫兵小将们反对得更厉害,作为毛著室俄文组的负责人,我曾被带到中南海接受“革命造反派”近4个小时的批斗审讯。最后请示到中央宣传口的领导同志,幸好他通晓俄语,得以圆满解决。这位领导下令放人,并肯定了俄文版的“省略”方案。(摘自《百年潮》第3期 徐坚/文)

## 那词